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北洋史研究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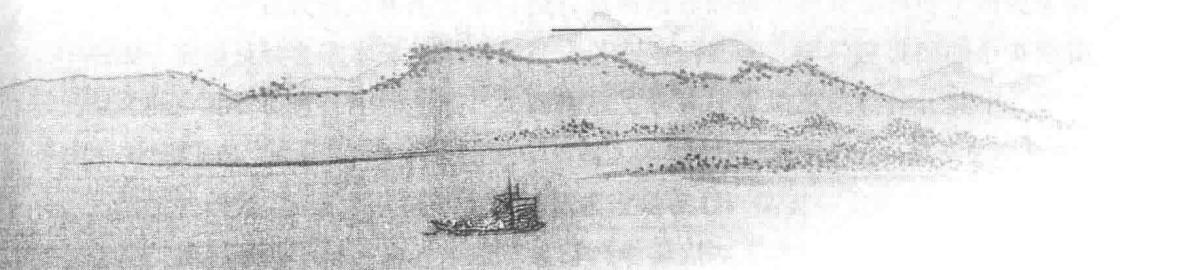
张华腾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北洋史研究新论



张华腾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史研究新论 / 张华腾.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1

(陕西师范大学丛书)

ISBN 978-7-03-046353-1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北洋军阀史—研究 IV. ①K25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0157 号

责任编辑：陈亮 任晓刚/责任校对：郭瑞芝

责任印制：肖兴/封面设计：黄华斌 陈敬

编辑部电话：010-64026975

E-mail：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4 1/2

字数：410 千字

定价：9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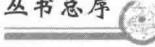
在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是一般教师关注的主要对象，教师们不仅关注自身的教学与科研，也关注他人的教学与科研，但对于学校和学院，高度关注的则是学科，即我们通常讲的学科建设。所谓学科建设，一般包含学科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学科平台建设，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和建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设置和建设，另外也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置和建设，以及其他各类研究平台的设置和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指师资队伍的规模、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科学的研究，主要指师资队伍成员从事学术研究所产出并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著作以及研究报告等。人才培养，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社会各行业的影响。学科建设的四个方面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科建设的有机整体。其中，学科平台是基础，有了学科平台，有利于引进人才和加强队伍建设，有了学科平台，才能招收研究生，进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是核心，拥有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和维持学科平台，才能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体。科学的研究是关键，科学的研究的成果体现学科平台的力量，也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学的研究能力，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人才培养是目标，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学科平台，同时，人才培养不仅必须要有师资队伍，而且必须要有具备科学的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才能完成合格的人才培养。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历史学科一样，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在2012年之前，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的外延建设。所谓外延建设，就是指增加学科的数量和规模，如拥有几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几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综合国力的

增强，民众对高等教育有更高期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高校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学科建设的重点由外延建设转向内涵建设。外延建设主要强调量，而内涵建设则更加注重质，外延建设为内涵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已有学科平台的基础上，凝练高水平的队伍，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统领这三方面的正是学科特色。凡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大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特色上。所谓学科特色，主要指在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凝练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产出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培养出一批在学术界和相关行业有影响的人才。为什么说学科特色是学科内涵建设的灵魂，原因有三：一是从人力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撑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二是从财物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持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发展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学科建设不仅要有研究团队，而且要有为研究团队提供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财力和物力，如从事历史学研究所必需的场所设施、网络环境和图书资料等，只有满足人、财、物的合理配置，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三是只有发展学科特色，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如果学科领域广泛，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必然广泛，相应地如果学科领域相对集中，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相对集中，成本低而利用率高。另外，发展学科特色，易于承传学术传统，易于形成内部合作，易于产出系列成果，易于团队培养人才，易于形成学术影响，也易于保持学术影响。

发展学科特色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作为历史学科建设，要充分考虑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这种优势既能更好地服务地方，也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学科特色。要注重已有学术传统，顺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着眼未来，长远规划学科特色。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实力地位，谋划学校能够实现的规划，因为学科建设规划只有在人、财、物的可持续投入基础上才能实现。

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依托地处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中心，考古资源丰富，出土文物规格高和数量大的优势，经过几代历史人 70 多年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特色，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获批，也是对这一学科特色的充分肯定。随着国家对历史学科精细化分类管理，原来既是门类也是一级学科的历史学一分为三，调整为中国史、世界史、



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根据学校地位的变化和学校对历史学科人、财、物的持续投入状况，面对三个一级学科的评估和建设，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思路必须明确，决策必须正确，行动必须快捷。环顾国内外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成功者，无不具有显著特色。我们在学科内涵建设中，特色发展是唯一选择。作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其统属的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是我校的特色学科，也是我校的优势学科，在国内学科建设的激烈竞争中，只有加大建设力度，才能保持优势地位。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地位，除了加大已有建设的力度，还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才能进一步强化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发展的大战略，为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我校历史学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不仅顺应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也是我院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体现。中国史升格为一级学科后，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势在必行，而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样极为广泛，我们也必须选择某一领域，重点建设，特色发展。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作为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样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也必将成为我校的学科特色和新亮点。

此外，文物与博物馆学也是学院谋求学科建设发展特色的一大发力点。2008年1月2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博物馆已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博物馆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但博物馆学的专业人才却明显不足，这就为高等院校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陕西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更是博物馆大省，博物馆的人才需求也相对较大。基于地缘优势和省内学科建设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我校在考古学学科下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陕西省文物局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家文物局在我校设立文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充分说明我校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符合陕西省和国家对博物馆人才培养的需求，特色建设博物馆学的思路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将在国内博物馆学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吸收国外博物馆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





索努力构建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彰显我校博物馆学的学科特色。

彰显学科特色的要素很多，但产出颇具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尤为重要。为此，学院设计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本丛书首批 17 本，均为学院教师近年新作，每本书的内容不少于三编，作者自序。丛书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希望通过出版本套丛书，集中展现学院教师近年来学术关注的领域和成就。鉴于本丛书是在我校大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开启之年规划完成的，故以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代为本套丛书之总序。

何志龙

2015 年 12 月 25 日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 C 段 209 室



自序

2015年，无论是从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是我个人经历、成长的道路来讲，都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的年份，恰值我60周岁，开始步入花甲之年，同时还是我从教40周年纪念的年份。^①如果从学术生涯说起，32年前我于河南大学毕业，开始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在《历史教学》^②发表处女作《郑观应兵战思想》，并得到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东元先生的函件表扬。^③而在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后，又开始对袁世凯与北洋史进行研究，并作为以后主要研究方向，屈指算来，也有20个年头了。另外，在北洋史研究方面持续深入，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得益于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老师的教诲和培养^④，恰好2015年7月初，从复旦大学毕业整整10年。在普天同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迎来了自己成长、经历的几个值得纪念的绝好年份数字，我将自己的

① 1975年高中毕业，开始从事农村教育。

② 张华腾：《郑观应的兵战思想》，《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③ 夏东元先生是著名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盛宣怀、郑观应研究专家。我与夏先生虽然素不相识，但久慕其名。我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一天惊喜地收到夏先生的来函表扬，原话为：“张华腾同志你好！你的郑观应兵战思想文章写得不错，我也没有注意到这点，但郑观应的有些资料你还没有看到，看到可以再丰富一些。”我是一个刚刚本科毕业的青年教师，夏先生为德高望重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竟然注意到我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并来函表扬与鼓励，我受宠若惊，马上致函夏先生表示感谢。此事忽已30年矣，我仍记忆犹新。

④ 姜义华老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史学理论与现代化研究专家，曾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六、七、八、九届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等，现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史尤其是近 10 年有关北洋史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不仅有必要，而且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本书的编纂正是基于上述机缘。

一、北洋史研究之前的学术研究简况

32 年前我走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道路，最初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主要受大学本科最敬爱的老师——河南大学教授胡思庸先生的影响。胡思庸先生是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鸦片战争史研究专家^①，他博闻强记，治学严谨，思想敏锐，逻辑严密，博通中西，淹贯经史，学风、教风朴实敦厚，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之所以走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道路，直接受胡先生的影响。幸运的是，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分到胡先生名下，得先生言传身教。论文题目《郑观应思想研究》就是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成绩自然是胡先生不轻易给出的优秀。后来毕业论文析分为《郑观应的兵战思想》、《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分别发表，这在 30 年前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在夏东元先生函件赞扬之前，我曾得到胡先生的表扬与鼓励。毕业后我还撰写了《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论谭人凤的思想特色》等，还曾顺应复归传统文化潮流，出版了《孟子语录》《佛教故事》等。^② 这些研究现在看来虽然比较天真和幼稚，但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由主要从事思想史研究转移至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研究方向集中于中华民国史、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近代议会史及宪政史研究，先后发表了《护法运动的下限与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变化》、《孙中山与广东革命根据地》、《宋教仁的法制思想》、《巾帼英雄马青霞》、《代议制在中国的厄运》、《近年来中国议会史研究》、《试析国民党竞选众议院议长的失败原因》、《天坛宪法草案新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述论》等。这些研究，集中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华民国史早期研究，有的研究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护法运动的下限与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变化》一文，是为

^① 胡思庸老师（1937—1993），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河南史学会会长等。

^② 《孟子语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查洪德等主编：《佛教故事》，《三教慧海》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986年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会与广东省政协发起的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论文；《天坛宪法草案新论》一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2年第2期摘要；《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述论》一文，是1991年由辛亥革命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发起的、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经修改补充发表于《殷都学刊》1993年第3期，后由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3年第10期转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第2期摘要。这些研究成果激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为下一步研究北洋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介入北洋史研究之原因

在我从事辛亥革命、孙中山、议会史、宪政史研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困惑。比如，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可谓新政的旗手，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改革，取得骄人成绩。其辖区北洋，实际成为新政的模范省区。其改革如编练新军，练出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加强了国家国防力量。其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人才。其经济改革，大力支持和扶持新兴工商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社会治理改革，创办巡警，天津、北洋区域治安稳定，为进一步改革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其政治改革，为宪政而从事地方自治试验，1906年在天津县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议事会。袁世凯派人代表自己表示祝贺：“今日为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可以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全省贺，不但为直隶一省贺，且可为我中国前途贺！”^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何能在辛亥革命中得到南北方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和拥护，至有“非袁莫属”呼声的高涨而被参议院全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什么登上大总统宝座，就立刻成为扼杀民主共和国、镇压民主势力的反动人物？是凶相毕露，还是其他原因？又比如，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时期培育的北洋军政势力，为什么后来演变为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什么在思想文化方面却一度繁荣？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够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什么于此时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如此发展，成就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如此

^① （清）甘厚慈：《天津议事会成立之日卢学使代督宪袁演说文》，《北洋公牍类纂（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等等，均为研究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早期史所避不开的问题，鉴于如此原因，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袁世凯研究和北洋史研究。

三、北洋史研究之主流

众所周知，关于北洋史，长期以来简单冠以北洋军阀史。关于北洋军阀及北洋军阀的统治，长期以来学术界是给予全面否定的，认为北洋军阀是一个反动统治集团，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最为反动和最黑暗的时期，北洋军阀对外妥协卖国，对内破坏民主，镇压革命民主力量，军阀割据，混战不已，民不聊生，因此北洋军阀是革命的对象，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必须打倒。我们的教科书以及绝大多数学术专著就是如此描述和解读这段历史的。在阶级斗争奋发激扬的革命年代，用革命史观解读北洋史是有一定意义的，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深刻揭露北洋军阀统治的负面影响，对动员民众投入国民革命、民主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弘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后继者中国共产党的前仆后继的奋斗，为振兴中华，建设美好社会付出的贡献和牺牲给予高度评价，在弘扬革命奋斗精神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北洋军阀被打倒近 90 年的今天，近代史学界主流，仍然如此书写这段历史就不可理解了。比如有学者继续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在卖国媚外的同时，对内则施行其凶残酷虐的统治”，“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丧权辱国，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① 有学者认为，“1912 年开始的北洋军阀统治，徒有中华民国虚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或拥兵自重，或恃强凌弱，相互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你争我夺”，“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导致了人民的反抗。^② 这些著作都不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专著，而是近年出版的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大部头中华民国史专著。这些学者总体上对北洋军阀统治是持否定态度的，其观点在近代学术界仍然居统治地位，尽管近年来传统观点受到质疑，但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北洋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其重要转型期，矛盾众多且复杂多变，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

^①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年，“绪论”，第 31 页。

^②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总序》第一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 页。

矛盾、反对外国侵略和向西方学习的矛盾、反帝与反封的矛盾、现代与传统的矛盾、革命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激进与温和的矛盾、开放与外患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纵横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冲突。对这样的社会和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不可轻易否定。正如有人告诫说：“不读尽天下书，未可轻议古人。然真能读尽天下书者，益知古人不可轻议。”^①

传统的北洋史研究开辟的基础性探索，为深入研究北洋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深入研究北洋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全面、客观地正视历史，必须抛弃感情因素和狭隘的党派利益。对北洋史的研究，更应该如此。郭沫若先生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曾说：“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② 评价历史人物如此，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何尝不是如此呢？

四、我的北洋史研究成果

自 20 年前确定将研究方向转至北洋史研究以来，我兢兢业业、刻苦攻读、孜孜不倦，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除了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台以外，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就是在自己的空间——书房静静地思考和奋笔疾书。^③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终于取得一批北洋史研究成果。这些北洋史研究成果，应该说还比较齐全。从大类方面来说有国家、省部级项目，有学术专著与学术论文，近 20 年尤其是近 10 年的北洋史研究成果可谓丰富多彩。具体陈述如下：

(一) 主持完成的省部级以上北洋史研究项目

(1) 《清末新军研究》，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完成，40 万字。

(2) 《袁世凯年谱长编》，2006 年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项目，已完

^① 张明仁：《古今名人读书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6cf0360102e3m2.html（2013-07-13）。

^②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86 页。

^③ 大学时代自然铸成的习惯，没有压力，没有功利，持续至今。不羡慕高官厚禄，不追随时髦华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随便说去吧。

成，220万字。

(3)《北洋集团兴衰研究》，2003年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已完成，35万字。

这些项目，均为北洋史研究范围，只不过《清末新军研究》范围更广而已，不仅研究北洋新军的编练与成长，还研究南方新军、皇室新军的编练与影响，为研究北洋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出版的北洋史学术专著

近10余年间，我出版了9部学术专著，其中的8部属于北洋史研究范围，具体为：

(1)《北洋集团崛起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32万字。

(2)《洪宪帝制》，中华书局，2007年，20万字。

(3)《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27万字。

(4)《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与苏全有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27万字。

(5)《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24万字。

(6)《陕西光复》(与两个博士生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9万字。

(7)《新政、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28万字。

(8)《1912—1915年的袁世凯》，译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25万字。

(9)《中国1913》，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26万字。

以上9部著作中，《陕西光复》为专门研究陕西辛亥革命及民国初年陕西政局及社会发展方面的著作，虽然非北洋史研究专著，但是在北洋史研究的范围之内。《1912—1915年的袁世凯》为译著，著者为美国学者欧内斯特 P. 杨，但在出版序言中阐发了自己的看法。《反复：艰难的共和之路》是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由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先生策划的丛书中的一种，实际是从共和道路艰难的视角研究北洋史的专著。上述著作或是从一个人物，或是从一个事件、一种政治势力着眼，分别进行北洋史一部分研究或整体研究，在研究中阐发自己的观点。

除学术专著之外，我还主编了三部北洋史研究范围的著作：

(1)《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56万字，已被不少大学列入北洋史研究的必读之书。

(2)《纪念陕西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孙文论坛论文集》，张华腾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92 万字。

(3)《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物研究——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张华腾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120 万字。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一书，是我 2004 年主持召开的“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精选结集。《纪念陕西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孙文论坛论文集》一书，是我 2011 年 10 月主持召开的“纪念陕西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孙文论坛”中论文的精选。《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物研究——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一书，是我 2011 年 12 月主持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论文的结集。三部论文集是学术界近年研究袁世凯暨北洋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对北洋史研究的贡献。三部论文集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负责从发放通知、组织会议、精选文章、校对修订到印刷出版等一系列工作。可喜的是这一切有效地推动了北洋史研究，三次会议的召开与三部论文集的出版，将载入北洋史研究的史册。

(三) 发表的北洋史研究学术论文

著作之外，我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北洋史研究的论文。从这些论文题目中可以窥见我的研究旨趣与研究内容。学术论文之要者，如表 0-1 所示。

表 0-1 北洋史研究论文、发表刊物及其影响

发表年份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转载、影响
2015	《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辑刊》2015 年第 2 期	南开大学 2014 年 12 月“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关于中华民国早期历史研究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河北学刊》2015 年第 9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河南大学 2014 年 8 月“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与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4	《武昌起义后清廷组编新军三军考略》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4 年第 5 期复印；《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14 年第 2 期摘要；美国周锡瑞等主编：《清王朝是如何覆灭的？》(Joseph W. Esherick and C. X. George Wei,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2014) 收录
	《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历史教学》2014 年第 2 期	—

续表

发表年份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转载、影响
2013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认同态度及其影响——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	《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	—
	《袁世凯在清末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	《中州学刊》2013年第9期	—
	北洋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	《倪嗣冲与北洋军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二次革命，一场可疑的讨伐》	新浪网“纪念二次革命100周年”专题采访，2013年7月	收入张晓波、周绍刚主编：《1913革命的反革命》，中华书局2014年版
2012	《民初“袁头币”的铸造、流通及其影响》	《历史教学》2012年第7期	2011年中国金融史学术研究会论文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中国的早期现代化》	《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
	《袁世凯对日本侵略的抵制与妥协》	《民国史研究》2012年秋季号	—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述评》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
	《义和团时期袁世凯新军实力的扩张及其作用》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项城袁氏大家族》	《寻根》2012年第1期	—
2011	《新军编练与新疆辛亥革命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1年第8期
	《袁世凯与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	《史林》2011年第4期	《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11年第2期摘要
	《纪念陕西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孙文论坛综述》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全文转载
2010	《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0年第10期
	《京汉铁路赎回的是非得失》	《南开学报》2010年第2期	—
	《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述论》	《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
	《洹上渔翁垂钓照考释》	《文博》2010年第1期	—
2009	《100年前中国大西北的珍贵史册》	《博览群书》2009年第8期	《新华文摘》2009年第6期全文转载
	《莫理循1910年西北行记——〈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史料价值》	《文博》2009年第2期	—

续表

发表年份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转载、影响
2008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5期
	《北洋军阀词语探源——简论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概念的使用》	《史林》2008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10期论点摘要
	《民国新旧约法与蔡锷的认同取向》	《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
2007	《袁世凯的军事思想及其特点》	《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
	《试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演进——兼论北洋集团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史学集刊》2007年第6期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8年第2期重点摘要，摘录6000字
2006	《对立中的统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	《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2期摘要
	《统一中的对立——民国元年同盟会、北洋集团的合作与斗争》	《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
2004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	《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摘要
	《周学熙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实践》	《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
	《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10期
2003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与康有为》	《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
2002	《试析庚子战前袁世凯对教案的态度》	《纪念和谈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1999	《清末练兵处述论》	光明日报 1999年5月7日	—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	纪念戊戌维新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	《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
	《袁世凯与〈临时约法〉》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
	《袁世凯与千年科举制度的废除》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

续表

发表年份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转载、影响
1998	《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	《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1998年第10期
	《北洋军河间会操兵力考订》	《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	—
1997	《蔡锷与袁世凯》	《纪念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论袁世凯对天津的治理》	《城市史研究》第13辑	—
1996	《清末袁世凯与岑春煊关系论述》	《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第2期摘要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	《殷都学刊》1996年第2期	—
1995	《宋教仁法制思想》	《南都学坛》1995年第2期	—
1993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述论》	《殷都学刊》1993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1993年第10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4年第2期摘要
1991	《天坛宪法草案》新论	《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 1992年第2期摘要

上述所列20余年的50篇文章，按照目前流行的分类法则，绝大部分为CSSCI以上的核心期刊，极少数为一般期刊文章。而这些文章，也并非我这些年所发表文章的全部，而是择其有关北洋史方面的内容。《北洋史研究新论》中所选择的文章，也不是上述所列文章，而是以近10年的文章为主，以早期文章为辅，以能特别突出新意的文章为主干，兼及北洋史研究的多个层面。收入文章27篇，仅4篇早期的文章，即20世纪90年代的两篇：《袁世凯与民初国会》（1996年）与《袁世凯与唐绍仪关系述论》（1998年），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的两篇：《代议制在中国的厄运》（1989年）、《护法运动下限与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变化》（1987年）。其余尽皆近10年所作，可谓新论。之所以称之为新论，更为主要的还是相对于传统研究而言，近年来的新思考、新想法，既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探索，又有微观方面的实证研究。应该说这些新思考和新论证，均具有学术创新意义，故谓之新论。无论新论、旧论，一律保持发表原貌，有些文章可能相互矛盾，但不作更改，以观自己思想的变化和学术的不断进步。但为了统一体例，对一些章目作了一些稍许修改与调整。

根据《北洋史研究新论》中所选择的27篇文章的内容，析分为北洋史研究理论探索、北洋集团研究、北洋时期人物研究、北洋时期政治经济研究四部分，